

見觀察

THE OBSERVER



編主平安儲

期七十第

卷五第

觀察
通信

局勢又臨緊張階段
華北大戰前夕鳥瞰
危世盛典(北平通信)

英國並未忘情遠東
外論選譯
一個面臨毀滅的世界
爐邊天下

Aldous Huxley

費孝通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特約記者

論政治變動
兩次幣制改革中之技術錯誤
狂瀾

陳仁炳
徐毓枬
劉緒斯

論政治變動

政治變動的法則

人心浮動萬狀，大局急轉直下。中國正面臨一個清末以來未有過的空前的政治變動。無論以變動的範圍和規模言，或以變動的基本原因的深遠言，這個變動都遠超過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二七年的局面。首先我們得認清目前這個變化的基本重心是政治的，所有軍事上的失利，其基本原因固是政治上的失敗，所有經濟上的亂象其基本原因亦是政治上的錯誤。本來，依據社會學的著法，政治變動不過是廣泛的社會變遷中的一部分，各時代的社會變動本不一定着重表現在特定的任何一方面。路德馬丁的時代宗教變動站在最前線，英國的產業大革命中，經濟變動推動其他一切變動。可是在我們這個時代，以談歷史的眼光來看，正進行在我們眼前的，首要的却是一個根本的政治變動。在理論的經濟主張上，對立的兩大勢力並沒有太大的歧異。政治延長為軍事，進而表現為雙方戰勢的優劣和有生力量的消長；政治控制着經濟，進而表現為幣制金融的混亂和人民生活的破產；政治影響人心，進而表現為今日普遍的社會混亂，人心浮動，民心喪盡。

冷靜地分析一下，一切政治變動的背後都是有法則可尋的。政治變動的造成，不起於一朝一夕，其由來也漸矣！政治變動的發展，也有種種跡象可以逐步按察。最後，政治變動的歸宿，亦有可以窺測的方向。美國社會學家 J. J. Coatsworth 氏，曾分析一般社會變動的過程，歸納為三個階段，第一為紛擾階段 (unrest)，第二為危機階段 (the crisis)，第三為調整與適應階段 (readjustment)。看今日中國政治變動，自亦不妨適用同樣概念作為分析的工具。粗略的說起來，今日政治變動，其種因遠當在一九二七武漢分裂時算起，近亦至少在近年政治會議的破裂，以及一大黨(點綴着二小黨)召開「國大」時起。兩三年來種種政治經濟上的動盪不安，青年學生對現狀的不滿，其總的契機即在這一點上，這是了解今日一切糾紛的關鍵。錯過這個關鍵，我們就無從認清目前政治大變動的真正緣由。近兩三年中一切政治上的紛擾不安現象，最後結局為總動員的宣佈和正式「戡亂」的進行，還可以歸納為變動的第三個階段。目前已至雙方作你死我活最後爭持的時機，政治危機已快達到頂點，不但戰火瀕於自然，即財政經濟金融生育教育文化各方面，亦瀕於一種生與死的邊緣。至於將來總結局如何，在朝野上下紛紛搬運逃生各自為計的今天，很多人心中還只有一個很空泛的驚駭和猜測。不過，天下沒有怕遲早也會有的第二個階段轉入第三個階段的一天。筆者在本文中，想對於現階段政治變動的來龍去脈，作一番簡單的分析

陳仁炳

一步錯步步都錯

今日政治變動，上文提起過，應以政協的失敗為契機。政協的失敗，這一邊說是由於那一邊搞亂，那一邊說是由於這一邊搞亂，這一個是非自有歷史家去下定論。我們在此時此地可以說的是：在一個時候，巨大的政權持有者的集團，因為一念之差，錯估了別人和自己的力量，可讓步而不讓步，可一還政於民而缺乏決心，自己造成三年以後今天的尷尬局面。正如曹錕的名詞雷雨裏面大家都熟悉的一個角色錯！一哭著說的那一句話：一步錯，步步都錯！一個錯誤產生更多的錯誤，一個矛盾產生無數的矛盾。一個根本的錯誤產生很多枝葉的錯誤，大矛盾之中又包含小矛盾，一直到全盤政治無一不是，令人興觀止之嘆。以「一還政」為例，因為要「擴大政府基礎」給美國看，不得不來個二黨聯合，於是鬧出中央提名啦，簽署提名啦，黨派互讓啦，甚至鬧出「抬棺」一絕食——一大串話劇，令人啼笑皆非。再以半年來的經濟措施為例，不改幣制不得了，改了幣制也還是不得了，壓低外匯率不好，提高外匯率也是不好，縮緊工貨不行，放寬工貨也不行，不提高公教人員的待遇過不去，提高真正能對付生活的水準，國庫支絀起來，還是個過不去。限價政策失敗了，取消限價政策却並未解決問題。不兌出點金銀不能保持些許信用，兌出金銀還是不能加增信用。即以這兩天全國存兌金銀的情形來說，原說無限制兌出的，現在好多地方每天只限兌三百人(或一百人)，數量上本無限制的，現在至多只能兌出兩甚至(如漢口)只許二兩。這麼一來，當初許許允允的「黃金」與維持秩序的警察之間的無意義的糾紛，早已離開一穩定金融——的題目萬里之遙了。自八一九限價改幣之後，在上海方面首先突破限價壓力作為飛漲現貨的導火線的，一般說就是烟稅的加額。香烟一漲，於是百物隨之飛昇，限價政策終於不得不宣告失敗，新幣制一再宣佈修改。這是政治矛盾的很好的例子。要知道財政部為應付戰費支出，減少鈔票膨脹，增稅所必行。加了稅物價固然要猛昇，不加稅的話，稅收銳減，通貨膨脹，結果物價還是一樣要猛昇。這就是所謂所謂矛盾必然的發展的一個最淺的例子。即以通貨膨脹問題來說，大公報載上海銀行公會發表的一個意見書裏面推測，金圓券在最近四個月裏面，可能要膨脹到二百三十億，這就是說等於八一九的百倍！這就是從內戰財政的矛盾裏發展出的必然結果。要「一亂」就不得不命令通貨膨脹，既命令通貨膨脹就不得不坐視物價作直昇式的高漲。結果是人民更痛苦，天下更一亂，政治上更接近最近最大的危機。

危機一發不可收拾

球的警號。我們這幾年看見的政治上的風潮太多了，學生心理的普遍的憂鬱，各地的反亂運動，公教人員的爭待遇表示，各種不安和反常的徵象，甚至在當權政黨的內部，也明顯的表露過很多反對和不滿的情緒。這都是明眼人不會輕易忽略過去的預算。愈是施用這政策，學生和青年愈對於現狀不肯屈服，凡此現象，有識者均當認為時代動向最彰明的兆。由微可以知著，由現在可以觀未來，由此起彼落的各種不安徵兆可以測大局的可能的動搖，和權威的可能的傾覆。歷史告訴我們，政治上每一次接近危機爆發之時，此種風暴前的警號，各樣預兆性的動搖不安，在數量上一定愈來愈多，在性質上一定愈來愈嚴重。到最後，一點風聲鶴唳即可發生極大的動搖作用。辛亥的前夕，民間充滿不滿情緒，武昌半夜一聲槍響，全國大局轉向。秦粵就衰，陳勝吳廣之徒登樓一呼，全局形勢頓轉。歷史上此類例子很多。從不安徵兆的降臨出現起，以至愈來愈嚴重的警號，以至危機之最後爆發，其間可以間不容髮，轉瞬步入另一階段，亦可以拖延周折，經過一個長時間的難產才生出新局面，歷則給我的例證殊不一致。研究中國眼前的政治的歷史，更不易遽下定論。不過我們在這裏特感興趣的有兩點：其一，在過去掌政治之權者作了些什麼來消弭或化除政治上的大危機及其各種徵兆？其二，在過去背後，今日政治變動的根源性質究竟是什麼？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們看見的答案是頗為叫研究現代政治的人失望的，因為太欠精采了。當軸面對如此巨大的危機，二三年來作了些什麼？除了枝枝葉葉的應付了一些臨時問題以外，我們很難看見一個根本的政治或經濟的長期政策。事實上，在基本政治矛盾上面，任何長期政策也不可能。每逢事到臨頭，就發這一個治標的緊急措施，那樣一個驚頭驚腦的臨時辦法。兩年以來，大家對於這一串的一以萬變應不變一各種緊急措施是太熟悉了。所謂不變的是一「亂」的基本政策，所謂萬變的是各種急時抱佛脚，修正了又補充，補充了又修正的「辦法」。最令我們佩服的，是當政者有一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的本領。政治根本不去過問，而關於枝節（例如軍、中學男女分校、禁口紅絲襪之類）的法令則特別多。「兵已渡河」，而「朝議」還在熱烈的討論提倡國術以及勤儉運動對神動員一類的案子；有許多與政府宏旨無關，而予民間極大不便的辦法，大可以不必執行的，但終於執行了；有許多多管政令，則知辦不通的，也勞民傷財辦起來了。這是我們觀察政治得到的一個印象。有人直直感覺到，歷史上很少一個戰禍，到了政治危機伏伏的時候，還能如此好整以暇地有這許多精力在小題目上作文章。

關於第二個政治變動的根源的問題，才非此處所能詳論，因為欲論中國政治變動的性質，先需明瞭今日中國社會及其變遷的本質。中國社會是一個半封建的社會，孫中山先生且不客氣地稱之為次殖民地社會。由於半封建的特性，中國今日的政治變動顯然

兩次幣制改革中之技術錯誤

徐毓柵

在消耗性的戰事延續情形之下，無論想什麼好辦法來籌措戰費，人民的生活程度總要受到威脅，——除非全部作戰物資（包括糧食）都由國外輸入，這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砲火對於國內人力物力的破壞與毀滅，還是出在本國人身上。如果在這種戰事情形之下，還不根據有錢出錢的原則來使財政收支平衡，而用通貨膨脹等惡劣手段來籌措戰費，則更引起嚴重的社會不公平，違反社會正義，愈是負擔能力小者，其生活程度之降低愈烈。這兩點經過常識，經過幾年來經濟學人之聲援，相已盡人皆知。因為衆所周知，故本文不擬從這兩點來檢討八一九以來的財政金融措施，雖然從這兩點而論，這些措施一無是處。本文是低調的，目的在指出：即使在惡劣的戰費籌措原則之下，如果執

與大多數人民的社會地位的升高有關。亞力士多德說，一切革命的基本原因都是爭平等的要求。（政治論，卷五〇）自民國以來，雖有有遠見的政治家如孫中山倡導於前，可是從來沒有一個政權真替老百姓作了些什麼。目前雙方的搏鬥，在經濟理論上，一方擁護的民生主義，另一方也並無意立即實行社會主義。雙方之間，甚至也不是如一方的宣傳的一兩種生活方式的鬥爭。然則爭點何在呢？爭點似在人民地位的真正尊重。這爭搏的結果，誰能爭取到人民，誰得到人心，誰就可以得到勝利。這句話應該可以算做公正而穩當的吧，因為雙方誰也不會肯承認這是指着對面一方說的！

政治危機到來的一剎那是可怕的：一切轉換得很快，一兵敗如山倒，在短時期之內，民心和士氣完全崩潰，「紀律（discipline）」蕩然無存，下級不肯用命，服從變為反抗，權威倒塌下來，芝加哥大學的 Merriam 教授這樣地描寫政治突變的情況。（見所著「系統政治學」三五頁）我們是否生當如此一個一盤世一呢？

四 變動中人民自處之道

幾句尾聲：在這空前的大動盪中，人民應如何自處？交戰雙方對「人民」又應持何態度？略敘數言以作結束。當然，問題這樣提法，本身就有些問題。人民已經參加在這大的爭鬥中，或至少被動地捲入朝浪裏，被視為魚肉，被用作工具。首先，人民應該乘此機會，在動盪的大時代中，更清激的認識政治現實，闡明各方面的政治責任，堅持人民自身應有的政治權益。在近三兩年頭的內爭中，多少生命犧牲，多少氣血拆毀，如果付出這樣大的痛苦的代價之後，大多數人民仍然不知道是為的什麼交貨，那就可惜了。慘痛的代價至少應該換來政治上永久的警醒，這也是知識份子當前的課題。

其次，在變動中我們應該力持鎮靜，避免無意的庸人自擾式的搬動和逃奔。近來在上海觀察有人在有計畫地散播各式的不近情理的謠言，說別本要如何如何云云。對於這一個「耳語運動」（Whispering Campaign）實在有加以對策的必要。最後，個人應在動盪中多分出一部份注意及於將來的中國的社會問題，因為今天確實不是如某些宣傳家所希望我們相信的，中國國運的轉了，而應該是更踏實的一個政治生命的開始。變動充滿痛苦的痛苦，但痛苦應該帶來快樂。此外，對於「交戰團體」的取法，我們希望他們對於老百姓的權益、身家、財產，有最低限度的顧惜，不要拿出過國際公法都不容許的手段。歷史上中國人民遭的一劫數一夠多的了，至少這一次不要又成為一場無意義的犧牲。廿世紀的政治變動，原不像歷史上「一姓一朝之爭」。今天世界上的政治變動，多數是有意義有方向的。

行技術稍為高明一些，一般老百姓還不至於痛苦到這地步。而這些技術，是應該可以想得到的，可以辦得到的，其不想不辦，因之更無可痛。

二

先從八一九幣制改革說起。為公平起見，我們得說，幣制改革之時機不能算太壞，在八一九以前的兩週，物價奔騰，市場混亂，不變亦不能收暫時穩定之效。平善老者百姓之踴躍將金銀外幣兌換政府，以及改革後二週內之物價無大起伏，可見人心厭惡變亂，企求穩定，即使不能有全面的穩定，局部的於經濟方面的穩定亦有勝於無。這種心理對於政府是最有利的，在政府債信不太好的時期，人民對於幣制改革居然有如此良好反應，無寧說是奇蹟。即使政府是代表特殊利益的，不肯損及巨額，即使在如此壞

前提之下，在技術方面還可以做一些事，使得預算平衡一些，使得物價漲勢緩和一些。以下兩件事，筆者認為應該在幣制改革令頒佈時同時實行的：

(一) 國營事業價格立即調整，使國庫不再因貼補國營事業營業虧損而增發紙幣。在八一九以前，國營事業之價格一向落在一般物價之後，所謂國營事業價格領導一般物價上漲者，至多是由於心理因素作祟。八一九以後一個極短時期內，人心觀望，不太浮動，在此時期內國營事業如果漲價，對於市場之心理刺激最小。政府却想不到這點，硬着頭皮維持八一九時價格，弄到一個郵局忙了一天，所入還不足十元；坐幾百公里火車，還不及市內乘短一段三輪車之代價。等到這段心理安定時期過去以後，那時倒真不能隨意漲價，到真會發生刺激作用，於是祇能硬撐，國營事業固然虧累不堪，而由此增發之紙幣，却更助長物價之上漲。

以上這點可以想得到可以辦得到而沒有做，實在是無可寬恕的。有人會說這大細枝末節，東北一地之濫發本票，而關內關外又有匯兌關係，其對於物價問題之嚴重，當然遠超過因國營事業虧損而增發的一些紙幣。是的，不過上面說過，本文是低調的，想指出即使在不損巨室之原則之下，技術上還有可改進之處。限制東北濫發本票，核實開支，大致會損及巨室利益，故未在本文檢討之列。國營事業在幣制改革令公佈時即行加價，使其能夠自己維持，大概還不至於巨室吧？當運費上漲時，生產成本增加，一切物品都要略貴，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如放棄硬性的凍結在八一九水準，而讓各物參酌實際的運費增加而一次提高其價格。運費在貨價中所佔比例，平均大致不太高，任其一次漲足，一方面使得限價較易維持，他方面減少通貨膨脹對於物價之壓力——起因於貼補國營事業之通貨膨脹。

(二) 在幣制令剛公佈時，即宜為新游資找出路，製造穩實可靠的儲蓄工具。所謂新游資，是指因收兌金銀外幣而放出的購買力。金銀外幣，持之不能生息，零星買賣，又動吧！上無法記，若非幣值日益低落，貯(法)幣極易蒙受損失，誰願持有金銀外幣？持之者祇是為保持幣值(此處指善良百姓而言，大戶極少去兌換)。這種心理應當極易了解，故即使為補充外匯資源需要，金銀外幣非收兌不可，亦宜於收兌之時，立刻為原持有人想新的辦法，保持其新換得的金銀券之價值。此事亦不難辦到，一年餘以來，經濟學人頗有主張發行物價指數債券者，經過一年餘的討論，此種債券之理論非難漸告消滅，技術問題亦漸見明朗。說得簡單一些，物價指數債券即物價指數活期存款，今日存入七元，合麵粉一袋(這是八一九左右平津市價)，以後無論在什麼時候提取，其本金仍可購麵粉一袋，再加一些利息(此處麵粉代表一般商品)。如果在幣制一公佈時即發行此種債券，其發行及銷售前途是否光明呢？因為實際上并未發行，故祇能設想其結果。人民既首以其多年來空藏的零銀外幣，交給政府，表示他們對政府尚有信心，這批人是最佳的物價指數債券收納人，很可能購買此等債券。實際結果雖不能確切推知，但在人心願願物價波動，企求穩定，而且對政府尚有信心之時，發行此種債券，當不失為一個良好的心理時機。事實上，在幣制改革後一二週內，有關當局祇看到金銀外幣之源源而來而感覺到滿意，認為幣制改革已告成功，并未想到這種「成功」所隱伏的危機，這種態度，不是利令智昏，便是過分簡單，缺乏經濟常識。

(三) 負責經濟決策者，應當像一個健全的參謀本部一樣，想到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估計各種可能性之或然程度，然後設法對付這種種可能性。負責決策人固然希望其成功，但亦想到如果失敗時如何收拾殘局，故為的作戰計劃有幾套，每套之下還有許多可供選擇的小分支。八一九幣制改革負責人却忽略了這點，在「祇許成功不許失敗」口號之

下，忘却或不顧可能的惡劣後果，等到惡劣後果已經開始顯著時(約略從九月底開始)，還企圖用政治力量變幹，變幹如果是大公無私，也還可以發生一些力量，而這點也還辦不到，於是束手無策，拖了一個月，病情益發嚴重。事先考慮不周，既經發覺危機，又未能當機立斷，即刻設法補救，這是第三點技術錯誤。

三

現在再說到十一月十二日起生效的幣制再改革。對於這個新辦法之評價，須看我們就哪一段時間看，又須看我們就哪一個觀點看，而有不同。

如果時間從八一九算起，把這個新辦法和八一九辦法合在一起看，則這個新辦法是非常不道德的。出爾反爾，時間前後不到三月，而黃金白銀外幣之收兌價增加四倍；而且黃金白銀之出售價則因須同時存款一年之故，實際上增加九倍，對於原先交兌金銀之人，却無絲毫補償。從其後果看，則又增加了財富分配之不均。以前交兌者大抵是善良守法不富有的老百姓，現在去收購者却是比較富有的人士。從出售金銀之效果看，大家又知道其不足久持。戰費支出是無底洞，而金銀數量究屬有限，即使全部售出，而且來購者的確用真正儲蓄來買，購買後不作抵押品向銀行借款後再買，即使如此，如果財政上不能想出更根本的辦法，這些金銀能支持多久？這三者都是較根本問題，但是上文說過，本文是低調的，不涉及這些基本問題。讓我們忽略這個新辦法之不道德性，又忽略其產生財富不均之惡劣後果，更採取極短極短一段時間(例如一二月)，而問這個辦法是否有穩定物價之效？如果有，何以現在沒有發生這種效力？

如果我們不從基本問題來非難他，那末這個辦法是應當可以生效的。理由如下：在金銀價格與其他物價之間，經常保持某種比例關係，通貨繼續膨脹情形之下，其他物價先漲，於是破壞金銀價格與一般物價間之正常關係，金銀變成相對便宜，祇要人民對黃白物尚有信心，人民便將用金銀換代貨物，換言之，由持貨改為持有金銀，即使物價不出圍，亦至少減少對於貨物之需求，於是物價趨跌，於是先前金銀價格與一般物價之間之正常關係又趨於恢復，這就是物價穩定。

何以沒有產生預期效果呢？有些不能歸咎於辦法本身，如果軍事情勢逆轉，人民都重物資(尤其是糧食)輕金銀，則不必有大量交易，物價即刻會哄抬得很高。但除此以外，技術不良也是原因之一。技術不良有兩方面，第一，沒有把金銀按時按需要運到指定地點，第二，兌換手續太麻煩。關於八、九、十三月全國各地收兌金銀外幣之統計數字，現在已很具備(參閱中央銀行金融週報第十九卷第二十期，廿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我們不妨暫時假定：各地要求兌換金銀之數，即其先交出之數，而在這十天(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準備時期，把這些金銀運達指定地點，不至於實行兌換還沒有幾天，即行告罄，一經告罄，「自由價格」立即高翔，聯帶着其他物價。這是第一方面之技術不良。至於第二方面之技術不良，也是不必要的：先開立存戶，然後再收入同額金圓券，兌換金銀。整套複雜手續之目的，祇是名義上仍維持金銀價格祇上漲五倍，而實際上却上漲十倍。我想這點「面子」是大可不必裝的，手續可以簡化得像以前收兌時一樣，見金圓券就兌出，兌換率改為八一九時之十倍。為達到財富分配平均目的，最好憑身份證購買，而且購買量有最高限度，但為收縮通貨着想，應該無限制兌出。如果為達到財富分配平均之目的，何必採如此惡劣手段呢？

總之，事先考慮不週，遇事手忙腳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且醫不徹底，遺付機構實在需要徹底檢查一下。

狂瀾

劉緒貽

近來大局在劇烈變化之中，一切好像是很動盪很混亂的。不過如果我們細心觀察，也可以在這種動盪和混亂之中，看出一些明顯的動象來，這種動象之一，便是我們本文所要說的由近來人口流動所形成的一種可怕的狂瀾。

我們只要是留心近來報章雜誌上的報導，便可以看出，近來由於戰局的轉變，我們各大城市的人口，有一種急速流動的情形，比如由長春到瀋陽；由瀋陽、錦州等地到平、津；由平、津、濟南、以及其他華北、中原各城市到上海以及其他長江流域或長江以南各城市；又由這些城市到香港、台灣、甚至於美洲、菲島等地。總而言之，是由北而南，由國內而國外；由「解放區」到非「解放區」；由不安全而不能享受地方到安全而能盡情享受的地方。

其實，由「解放區」到非「解放區」的人口流動，是內戰開端以來便起始的。不過，從前這種流動是比較細微的，緩慢的，不顯著的，由鄉村到城市的；而近來則變成巨大的，急速的，顯著的，由城市到城市的。

一

從這些流動的人口的身分說，除了學生公教人員以外，大都是達官貴人，尤其是貪官污吏，以及豪門、富商、大地主和他們正式的眷屬及僕從等。我們試一分析這種人口的特性，大約有以下幾點。第一，從經濟的立場說，這些人都是只消費而不生產的人。雖然消費的力量，因各人身份而不同，（比如錢太大的消費力量，當然比流亡學生的消費力量大些。）但且為不生產而只消費則是一致的。所以一個社區，增加或減少這一種人，尤其是驟然的增加或減少這一種人，便增加或減少一個社區的負擔。具體的說，「解放區」驟然的減少一大批這樣的人，所以「解放區」減少一大重負擔；政府控制的區域驟然的增加一大批這樣的人，所以政府區增加一大重負擔。第二，這些人之中，只有少數人，也許是極少數的人，是誠心要追求所謂「思想自由」的，然而大多數的人，都是怕留在「解放區」裏受清算，（如貪官、污吏、豪門、漢奸等）或不願留在「解放區」勤懇工作并稍為降低生活程度的人。一個社會增多了這種人，這個社會的政治會變得腐化些，惡化些；工作會變得缺少效率些；意志會變得消沉些。一個社會減少了這種人，這個社會的政治會變得清明些；工作會變得有效率些；意志會變得昂揚些。

由上面這兩種特性所產生的作用還是比較消極的。另有兩種特性，使這種流動的人口在被流入的社會中產生更積極的影響。第一，這些人多半會欺侮人民，加深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嫉恨與鴻溝。我們讀「觀察」五卷十一期「瀋陽失守的尖銳報告」，想像那些從東北「劫掠」（諧接收之音）數年，仗勢凌人成了習慣的貪官污吏，而今大批的流到政府後方，有錢有勢，不啻虎生翅膀，我們能希望他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嗎？何況，有錢有勢的人，是到處成夥，「官官相衛」的呢？一個從濟南逃到青島的人描寫

他親身的經驗說：「青島，……對我沒有發現什麼留戀的地方……相反的只是一些不快人的感覺，中國老牌純粹的人事關係，幕後活動在這流亡的羣層中，……同時一登斯土，身份階級又給鮮明的劃分出來了，這些給予我們這般低級流亡人員的是不能算怎麼好的一種感覺」。（「自由批刊」一卷十期）其實這還是稱得上流亡「人員」的人的經驗，至於一般人民所受流亡人口的欺侮，則更有甚於此者。「觀察」五卷十一期讀者投書欄內的「政局、學生、百姓」一文中說：「他們（流亡學生）光臨後，老百姓的橘子、柚子、甘蔗、蔬菜、竹子、花生、雞子，……都被他們搶光、吃光、殺光，不但不給錢，（當然亦有好學生給錢）時常還要打罵老百姓。城內的舖子，不知給他們搗毀多少家了。十天內，聽說打死了一個坐汽車的客人。最使人寒心的，他們却集體強姦過三、四次（也許不至四次）婦女，其中一個孕婦，在輪流強姦後死去了，還有一個不滿十五歲的女孩子，也被強姦了。弄得本地百姓怨言載道，敢怒而不敢言，看到了學生，莫不遠而避之。」我們讀了這段文字，雖然同情流亡學生的窮困，能不更同情受他們欺侮的老百姓嗎？固然只是少數流亡學生如此，我們希望知識青年將這種傳統讀書人把老百姓不當人的意識與態度完全肅清，因為這種意識與態度，是招致目前動亂與顛沛的重要根源。話又禁不住說遠了，其實我們這裏只要說明，近來政府區中驟然添了大批流亡人口；而這種人口的行爲，又在加強一般人民對於統治階層的怨恨，大大減小人民與政府間合作的可能性。

第二種能產生比較積極影響的政府區近來添加的人口特性是：除了學生與少數低級公教人員而外，這些人大都是很有錢的；也可以說是富有大量游資的。在目前這個通貨膨脹的時代，握有大批游資的人到了那個地方，那個地方的物價以及整個經濟便會受到深刻的影響，前不久的上海和武漢，便是很好的例子。物價上漲引起生活困難，生活困難引起人心浮動，人心浮動引起整個社會不安定。根據許多報導，東北各大城市的腐化，一部份是吃了游資作祟的虧，目前政府區的各大城市內，除了原來的游資以外，到香港、美國去的人，帶走了外匯，吐出了大批游資；從「解放區」或戰區來的人，帶來了大批游資，這些游資作起祟來，政府區加速度的腐化是必然的。

二

由於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大體看出目前人口流動對於「解放區」與政府區不同的影響。這些流動的人，不是社會的腐蝕菌，至少也是對於挽救大局無用的人。一個社會之中，這種人愈多，這個社會一定愈腐化，愈癱瘓，愈接近崩潰的邊緣。政府之中，也未嘗沒有腦筋比較清楚的人，可以看出這種人口對於政府區的腐蝕性與負擔，但「兒女情長」是人之常情，既然這些人大都是政府的眷屬、族人、戚親、朋友，多年培植的門生幹部，及其他各種有關係的人和他們的眷屬；換句話說，既然政府的基础是建築在這些人之上，所以政府實在也沒有辦法，也不忍制止他們，不朝著安全而舒服的地帶流動。何況政府高級人員既然把太太、公子、小姐等送往香港、美國、又如何好意思叫人家不流向安全而舒服的地帶呢？因此，他們用金錢、大量金圓券、權勢、面子、人情、

力量等，擠上飛機、輪船、火車、汽車等等，形成了一股迷離的狂瀾，任何人也抵擋不住。不過，他們從前既然腐化了東北各城市，使十三個精銳軍隊變成廢物，自然他們也會腐化上海、漢口、廣州、台北等，使守衛這些地方的精銳軍隊變成廢物。這是社會力。我們學社會學的人，深知這種力是人性對於文化，尤其是對於社會制度和風氣的反應，一經形成，是很難扭轉的。而且在短時期中，尤其是在有外力壓迫之時，更不是少數人的力量所能扭轉，只有日加深重的份兒。搶着逃難的人，明明看着船已過重，再多加一個人，只不過是增加這個船沉沒的速度，但能夠擠上的人，仍然向上擠。愈擠愈增加船

的危險，愈危險愈擠，不到同歸於盡不止。向上海、廣州、台灣跑的人，明明曉得（也有一定曉得的）上海、廣州、台灣這種逃難人口的增加，會加速上海、廣州、台灣的腐化和崩潰的過程，但仍然加速度的向上海、廣州、和台灣等地擠。愈擠愈危險，愈危險愈擠，不到同歸於盡不止。有些人平日不大寫時論的文章，不貢獻什麼方案和辦法，就是因為他們知道這是一種既倒的狂瀾，無法回轉，至少是不易回轉；而在這種狂瀾未轉之時，一個方案，一種辦法，都好像是投向大海的沙粒，不會起什麼漣漪的。

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於珞珈山

一個面臨毀滅的世界

Aldous Huxley

A World Faced with Destruction The Listener Nov. 4, 1948

（赫氏訪問達文坡（John Davenport），就便與之討論他的一本近著。下面是他對達氏的談話）

我最近在美國出版的 *Ape and Essence* 是一篇幅很窄的書；它是關於人類將來，或一個假想的生物學與原子能戰爭以後的世界的一種推想。書中的故事大略如下。我假設一個多少遭受了重大摧毀的戰後世界；我們在這裏所看到的，是一個科學遠征隊從新西蘭降臨，在加尼福尼亞海岸，開田。這遠征隊之所以從新西蘭來到，因為這裏是地球上還來不及摧毀的很少區域之一。遠征隊在此尋找安南斯（Los Angeles）的足跡；本書故事即是在這些科學家之一，從住在這一龐大城市廢墟中的一些奇怪野蠻人那裏所得到的。故事中的詳細情形這裏不必提，不過，一般說，這些被保存者的主要特徵則是如此的：他們起初人數非常稀少；而且大部份的孩子，由於輻射而使生殖細胞內發生了變異，被生下來就有遺傳上的缺陷。這更有一種免暴的宗教信仰，其中有一種儀式是要以這些生下來不完形的孩子們作為犧牲。這情景充滿了死的恐怖，它無疑是現代極端進步技術及其對於自然事物不良影響的極端情形下的產物。

原子能輻射作用給予生理的

影響

我以為這故事的整個情形是不可能的。原子能輻射作用對於生理的影響已是一般生物學者與生理學者討論很多的題目。我曾經看到對於這題目的許多不同意見。有一個困難是：縱使我們在戰爭中避免使用這種原子能，我也不能不認定，它在工業中的使用也是富有很大危險性的。

的。畢竟沒有工業能使之十分穩妥，以致從不發生意外不幸事件；而且利用原子能的上級或帶燈，其每一件意外事故不將導致目前更嚴重的即見結果，而且會發生一種永久性的不良影響。假如這些從災害中幸而保存生命的人不使之節育，則他們或者將攜帶這種有害的遺傳上的突變結果，使之於無窮久遠。某一定時間的極其比較，當的意外事件，其結果將無限期影響到後代的歷史。我以為這裏埋伏着一種真正的危機。我不確切知道，我們將如何去避免這玩危。顯然的，假如我們用細心為計，你可以十二萬分小心的加以防備，但我依然不能想像，我們必然是百分之百的安全。

有一回如此的事。一年半以前，特克雷斯港口（Texa Spout）發生了一次可怕的爆炸；當時有兩艘運載硝酸的船失事，結果城市內有一大片區域也着火燃燒起來。也就在那時，我記得，有兩多物理學者紛紛發表意見，主張原子能的實際運用首先或以駕駛船舶為最適當，因為船舶可以大規模運載特殊重量的二合土與鎔質所現的輻射輻射作用的設備。假如這些船舶發生了爆炸，則如我所能想像，必然是一次巨大的摧毀，大的災害將遍及港口四周的所有建築區域，而且有害遺傳上的突變結果也將一代復一代，永無止盡的傳遞下去。

在我的想像中，細菌戰爭的危險與恐怖較原子戰爭的更為厲害。這裏，首先一個問題是如何控制它們。可是實際上，現在還沒有一個可能想像的方法，用以控制細菌武器的製造。就原子戰爭說，世界上只有很少的幾個地方出產鈾，這自然使我們很便易於加以注意；而且需要龐大與非常浪費的工廠以處理這類原料。可是在生物學戰爭方面

正相反，只需要價值幾千鎊的設備與一個中常大小的房屋，即可製造所有需要的細菌材料。沒有可能的方法，用以知道別人在從事生產細菌的工作；而且只要願意，即可以很容易的把它佈佈到那裏。事實上，如果兩個彼此相隔甚遠，不曉得有把自己帶入同一個細菌戰爭的危險，我以為這情形對於使用它是一個大的惡感——它帶來極其可怕的前景。據我所知道，所有現今強國已有了專門實驗室研究細菌戰爭的可能性——如何培植有百分之百致死性的微生物菌，以及分配它們的方法。許多報告實際上已經針對這一題目提出討論。

人們能否因此感到有某種的危險呢？這是非常難說的。恐怕自然好比一把兩面刃的刀。你可以嚇人們使之發覺，你也可以恐嚇人們使之成一種毫不注意的驚惶。我一直以為情形將是這樣：假如原子戰爭或細菌戰爭有一天降臨的話，由於全世界大多數人民，已經多年聽熟了關於這類戰爭的恐怖故事，當戰爭降臨之時，即晚報大標題與電聲廣播聲稱細菌戰爭時，可以散佈出原子彈秘投時，我想我們一定會看到一種驚慌的國家，那景象將使上次大戰時由魯舍爾與巴黎逃難出來的行列較之顯得極其平常。假如一個人去查看像紐約那地方，他便能想像那樣的恐怖將是怎樣。從華盛頓到大陸，有三個陸道，十五英里水程，一座橋，幾百萬人民在這些通道上疏散。這些人，當其到了紐約的另一面，則他們將發現自己已置身於方數百英里的龐大建築區域中。這情景看來，只要預先有幾年工夫造成了恐怖的心理狀態，你便不必自討麻煩去投一顆炸彈或釋放一個細菌，祇要放出這個消息即幾乎可以毀壞這裏全盤的工業經濟。但我這裏所說的情

況

形與上述恐怖的兩種結果均不同。我真不知道：是恐嚇人民好，抑不恐嚇人民好。不過事實上他們已經被恐嚇，而且，我想，他們將遭遇到更多的恐嚇。

爲了某種觀念而自殺嗎

人們會真的爲了某些觀念或事物而自殺嗎？我一向似乎認爲：人們對於一件具體事物取得同意是非常比較容易的。舉例說，假如我們把注意力由權力與意識形態純人文方面的問題，轉移到食物或人與環境關係的所謂科學問題

方面，則我的確以爲，國際間的同意有了很大的獲得希望。首先，人及其環境的所有問題，基本上是一個技術的問題。在不破壞土壤原則下生產更多食物，從這裏我們易於知道許多關於技術的問題，所以我們不必爲此而殺死別人。沒有人爲了如何製造硫酸而殺死別人的，因爲我們知道如何製造它；對於這類問題只有一個答案。可是另一方面，假若你問：最好而又可能的政府形式是什麼？則沒有人知道；而且無論如何，同一答案不能運用到所有的人民。所以這裏結果產生了趣味，任何種種理智行爲的方式均代之

以盲目信仰，狂妄主義以及教條崇拜——換言之，一種自以爲是，並因以害人的觀念型態。所以我認定：解脫當前困難最有希望的道路是把我們的注意力，由這些完全不得解答的權力與觀念型態的問題，轉移到如食物等可能解答的問題方面來。如在目前即切的裁減軍備問題，假如我們開始就討論原子彈，而且假定美國人說：「如若你毀壞十輛坦克車，我就消滅一個原子彈」，情形也許可以不同一點，那麼，我們便有了一個實在的具體基礎，因之可以做成許多國際間的買賣，至少因此有了達成某種相互同意的可能機會。（觀察特約譯者譯）

英國並未忘情遠東

費孝通

大凡一個國家的可愛之處也常常就是它使人奈何不得，甚至難於應付的地方。英美兩國雖則語文相同，性格却因歷史殊異而略有差別。英國是持重，富於現實；美國是衝動，富於浪漫。兩者各有其風格之美，但是現實者不免重利，浪漫者易於用情，重利者過分寸，也就會使和他們打交道的人傷腦筋了。歷史上，法國吃虧最大的是英國的過於現實。儘管英法在近代歐洲的爭霸中最後總是站在一起的，但是每次英國在事先却又是總是抑法助德。德國戰後的復興沒有英國的容忍和扶植決不易爲功。法國人心裏怨恨英國的真情，有苦難言。德國吃虧最大的是美國。兩次大戰都沒有把美國參加打入算盤，但是兩次都失算了。說德國軍部情報不足似乎太低估了這霸王的能力，原因還是在美國衝動起來難以常情推測。

用民族性格來探討國際關係未免措而不莊。其實所謂性格云云也祇是歷史的產物。英國是現代工業的發祥地，靠他帝國主義的擴張，一世紀來構成了一個很特殊的經濟體系。富於煤鐵的三島，缺乏自足的食糧和工業原料。他是一個工廠，不能關門自給的。百年來商業經營，在海外靠了海軍的威力，建立下一個龐大的帝國，像一個有租米可收的地主，家內的生活有一半要取給於投資的利息來開銷。堂皇的排場少不得殖民地的供養。這個經過長期歷史所孕育成的基本事實是每一個英國人所身受體會的。英國人自己比喻是個水手，驚風浪險中掙持的同舟夥伴，嘴上話儘管漂亮，到緊急時，爲了生死存亡，誰會不齊心硬幹。有着帝國的利益作爲目標，利害分明，不易模糊。什麼道義，什麼公理，在作生死拚命的人，真是婦人小子之見罷了。乾脆、明爽、固執、持重、不到臨頭不踏風險，

——都是這個歷史遺下的性格。最容易明白的是比較海戰和陸戰。海戰沒有多大僥倖可圖的，硬碰硬的，而且主力戰在短期間可見分曉，敗則永沈海底，勝則控制萬里。不像陸地上，有山有澤，可以躲躲閃閃，兩軍會師，也不一定能夠得出全面接觸的陣勢。空間可以換時間，空間又可以分散敵人的主力，運用上變化多，主帥要有耐性。拿破崙都會陷入帝俄的泥潭，和納爾遜遜屈拉佛爾加一役相較，真是英雄氣短了。——英國人的性格是海軍的性格。

美國是個大陸國。經濟自足，隔門也可以面團團作富家翁。這是說：這是個退可以守的國家，和英國根本不同。一個倉庫裏常常儲備下一個冬天糧食的鄉下富戶，慷慨不傷生計，他用不着斤斤較量，人情重於實惠。我並不否認美國在這次戰後確有一部分工業界的大老闆想步英國後塵，做個美國世紀的好夢。但是這個夢在普通人是不太感興趣的，尤其是如果爲了這個「帝國」要美國子弟離開幸福天堂，拋棄情人美妻，遠戍異國，在沙漠裏曬太陽，在冰島上挨西北風，他們是看不出這「帝國」的意義的。何苦來呢？不要以爲大英帝國是野蠻長的鮮果，它是無數英國兒女的血汗建立出來的家產呀！美國的兒女有着現存的樂園不享受，要他們出來流血拚家產，真是爲誰辛苦爲誰忙呢？（最近居然有人把遠東帝國送上門去，老美還會考慮再四，收呢不收？這真使買辦們弄糊塗了。如果早五十年賣給西邊這個買主，大概買賣早就做成了。）

青年人戀愛忙，在日記上排 Dating，政治多無聊？像今年這種有關世界和戰的大選，祇有一半選民去投票，不是充分表示他們政治興趣的淡薄麼？但是在他們的政壇機構中，民意却又是最後的決定者。在平時，這些人把大權交給各級的政客們去玩弄，但是偶而出來，大事找到了他們頭上，他們却要顧問起來了。臨時的關心，對於問題的結核還沒有弄得清楚，所作的決定，也就不免帶着感情色彩。老美有着他們傳統的成見，這些成見有時和短期的利害打算不大相合的。於是被認爲浪漫成性了。

向美國打交涉的困難也就在此。祇是和巨頭們講利害是不夠的，還得造成民間的空氣，至少得避免許多美國的忌諱。譬如美國自己儘管種族不平等，儘管民主不夠標準，儘管也有帝國主義的野心，但是他們的成見是討厭這些忌諱的。你天天捉學生，殺異己，嘴上說自己民主，他們會覺得你在侮辱他們的偶像。美國官場固然也不是太清白，但是借了人家錢，吓自己的腰包，又會引起他們的反感。更重要的，美國最重要的傳統是在尊重自己，一個搖尾乞憐的走狗，他們會厭惡，敲詐他們的流氓更爲引起他們的恨毒。美國人民確是會上當的，譬如大老闆們爲了自己利益要去爭霸歐洲，但是他們却還是不肯不用「復興」「救濟」那一類好聽的名目去說動他們老百姓。就是反蘇也得借「民主」「自由」一類的口號。杜威的慘敗主要還是美國人民不放心他的現實味兒。

我們不應忘記的是美國是個可以自足的國家，這可以守的。他們用不着拚了命來爭利，要他們的錢，要他們的命，還得有個名目，一個趨於普通利害的理想。這可以說是美國人民的可愛之處，但是也是使許多人討沒邊的原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危世盛典

觀察特約記者

籠城安定與學術高揚

(觀察北平通信)

北平將為籠城，但城內人心安定，學術空氣却更加濃厚，本月份將要

到來的盛典，一是本月十週年紀念，一是將由梅貽琦校長六十歲大慶

四郊的砲聲可能由美國司徒大使主辦的燕京大學首先表示一不受

時局動盪影響，本校課業照常進行，一週者是

北京大學教授中，亦不願校一，清華教授會

同時也有絕對不願學校一，清華教授會

仍在一搭三籠中。黃曾城可以說是一位有能力的

的適宜讀書的環境去。教育部的意思是希望東

北大學遷福建，潘陽醫學院遷歌樂山，長白師範

遷遼陽，長春大學遷瀋陽。北平的各大學的空

氣是沉着而寧靜。除了成軍的遠行外，

在那裏的，却走入圖書館，走入實驗室，甚至

體育場上也兩是在練習身體的人。北大理學院

院長饒毓泰說，這和抗戰的初期大大不同了

前的小廣場中，由胡適校長作首次的對全國廣播

。他將說明北大不是那一個政府的，而是三

朝的老元老。特別展覽有「校史展覽」有一「煌煌

文物」，六個學院分別舉行自己的專題講

「世與學術」，陳寅恪講「一切社會性」，法

學院請錢端升講「海外歸來」，陳達講「一海

歸來」，實科的各學院別舉辦討論會，為五

國際上的不干涉主義

正在抬頭

清華學生，曾任北

大政治系主任的錢端升教授，十三個月前應美

國哈佛大學之聘，主講「中國政府」一書，並

且以每日工作十二小時的速度，又同時完成了

一「中國政府」一書，這滿足了他二十年來的

期望。在八月西清岸罷工的商船，然後方與吳有

的商船，然後方與吳有軍艦等船，暫時一月

與容忍，使清華人的學術地位日高升，毫不

亞於北平人的成就。這又一盛典，將另有一種

隆重與熱烈。

來賠償我們的損失？那些船上的水夫們却安

慰她們道：「一定讓你們早點回去，趕上過聖誕

節。這就是說雖然不能與丈夫團聚，但也趕得上

上看到本國的親人。錢教授環行京滬一

週然後返平，對美蘇戰爭與否，他說可能性各

了錢氏的護照上特別注明可以登陸外，其餘的

中國人一併為非籍海關官員禁止上岸，連船上

的美國人都為黃色朋友掉不平，而上不去的人

交涉結果仍然是不准上去。一位講授現代政治

學的學者，他面對這樣的現實，其感慨一定比

任何人更要多些，可是除了一路上的風光外，

他仍然不願涉及太實際的問題。六日起他將又

在北大紅樓陰影下的鐘聲裏，走上北大的舊講

「一百年來」，周炳琳說，「中國經常在

混亂，辛亥革命、北伐和目前的局勢，不過

是混亂中的幾幕戲劇，演得特別熱鬧，有全武

行的情形。中國可能還有五十年，一百年，二

百年，或更多的混亂，或許有更多的戲劇節目

目出現。

周炳琳在國民參政會更提出了一政治混亂

一四個字，當時的意思是指政府對於內政、外交、抗日等大事都沒有

一個進步的

老國民人鄭平呼籲武

力不能解決問題，這是

對於時局的正面表示。

他用正統的邏輯肯定了

辯證的發展，他的中心

含義是指出近百年來中

國中心問題就是革新問

